

## 灵活调整政策加强经济韧性

我国的全球竞争力排名从榜首滑落到第五位，表现是自2013年以来最差，当年我国也是排名第五。尽管如此，我国的竞争力在亚洲仍然居首，是唯一跻身前五位的亚洲国家和地区。

在瑞士洛桑管理学院（IMD）全球竞争力排行榜上，我国过去连续两年都高居榜首，今年被瑞士取代，排名第二到第四位依次为瑞典、丹麦和荷兰。

IMD的最新报告指出，我国排名下跌是经济受到2019冠状病毒疫情的冲击，导致生产力下降，就业率下跌，冠状病毒大流行也造成政府赤字和债务增加，以致公共财政情况严重恶化。

我国政府在2020年总共推出五次财政预算案，总额接近1000亿元，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以帮助企业和

国人渡过难关。在2020年，我国的总就业人数创下20多年来的最大跌幅。

全球竞争力排名的下跌，反映出难以掌控的冠疫情，以及外部和内部各种环境变化对我国经济造成巨大的冲击，而国土面积小、人才受限及出口导向型经济等客观条件，导致我国在这场严峻的疫情下，在应对经济难题上比其他经济体更吃力。

不过，我国在四大排名因素之一的“经济表现”中名列前茅；在全球次要因素（sub-factor）国际贸易和科技基础设施这两个方面都排名第一，在另外两个次要因素国际投资和商业立法方面，我国的排名也很高，均排在全球第三。

疫情突如其来，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面对严峻复杂的

国内外不利环境，我国经历了一场艰苦的经济大考，而这场大考还未结束。

简言之，政府不仅须设法逐步恢复经济和社会的运转，更积极地推动经济转型，还须通过各种管道协助员工提升技能。这场全球性大流行给我们上了宝贵的一课，唯有能及时灵活调整政策，才能防范经济大起大落，尤其是避免出现硬着陆的情况。

正如IMD所说，各国在应对冠病大流行时所展现的经济韧性的强弱，皆反映在今年的排名上。IMD报告也发现各经济体投资在创意、数码化、福利及引导社会凝聚力上的质量，能协助国家更好地应对危机，在竞争力的排名上也会更靠前。

2013年我国全球竞争力的排名滑落至第五位时，IMD当时提出我国可以

加强对中等收入群体的援助，同时协助公司控制成本上升的压力，就此改善我国的竞争力。在过去几年，政府已通过各项政策来改善这两方面的情况，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

去年排名第三的瑞士，就是通过各项经济表现的改善，使得今年排名升上第一，特别是用力在国际投资和就业方面。瑞士不仅在商业效率和管理作业方面取得改善，也在基础设施及教育方面得分世界第一，在保健和环境保护方面的排名也升上第三。

IMD的报告中值得我国关注的地方，我国虽在经济表现位居第一，但在全球商业效率方面从第六位跌至第九位，在全球基础设施方面从第七位跌至第11位。贸工部长颜金勇在面簿上指出，IMD的报告显示我国正

对日益激烈的全球竞争，我们不能站着不动，将已有的经济竞争力视为理所当然。

在疫情暴发初期，虽然我国采取了坚决果断的防控措施，经济却无法避免地受到冲击，因此稳住经济依然是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同时必须关注可持续发展道路上所面临的各项挑战。

具有经济韧性不仅能保持一国的竞争优势，也在对抗冠病大流行上有助益，我国要继续加强这一韧性，必须制定提高竞争力的长远愿景，拟定未来的经济发展蓝图，包括投资在必要的基础设施上、培养特定的专业人才；而企业必须有创新能力以及探索和掌握新商机，员工则必须继续自我提升技能，唯有所有引擎都发力，才能保持住领先地位。

## 与冠病共存之近期展望

2019冠状病毒疾病肆虐已一年半有余。随着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SARS-CoV-2，即新冠病毒）不断变异以绕过人体的免疫防线，它给我们带来了不同的挑战。

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专家都认为，冠病毒将与我们共存。它将继续进化，而我们人类将继续研发疫苗和治疗方法来对抗它。在短期内，人类与冠病毒的抗争预计会充满变数，疫情偶尔会因病例突然增多而反复无常。人类和导致冠病流行的病毒的未来将会如何？

### 了解冠状病毒

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冠病的病原体SARS-CoV-2。这种病毒的起源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才能得出合理的结论。以2003年暴发的沙斯疫情来说，病毒学家也是花了数年时间才证明蝙蝠作为原始宿主和多个中间宿主（包括在野生动物市场出售的果子狸）之间的动物联系。

然而，冠病毒对人类来说并不陌生，有四种季节性冠状病毒可导致反复发作的轻度上呼吸道疾病（俗称感冒），以及迄今为止的三种人畜共患冠状病毒，即SARS-CoV（沙斯）、MERS-CoV（中东呼吸综合征）和SARS-CoV-2。

冠状病毒可感染许多物种，但人类冠状病毒直到1960年代中期才发现。它们无处不在且性情温和，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和采取治疗性干预措施的需要。追溯冠状病毒的基因进化，有人认为所有的冠状病毒都起源于动物，但没有人知道它在人类宿主中存了多久。

2003年的沙斯是毁灭性的，导致严重的疾病和许多感染者的死亡。这是新型冠状病毒出现在陌生的新宿主的常见影响。几乎所有受感染的宿主都出现可识别的症状，因此我们能够有效地从人类中将沙斯隔离、控制和消灭。可是，

SARS-CoV-2的行为与其近亲有很大的不同。今天，人们普遍认为，它将继续存在，与我们共存，并且无所不在。

### 揭示冠病毒的行为

SARS-CoV-2是一种难以捉摸的病毒，我们对它的了解不足以准确预测其发展轨迹。所有的核糖核酸（RNA）病毒常常会发生变异，因为它并不总能完全准确地复制其基因密码。一般认为，冠状病毒的变异率会比流感等其他病毒的变异率来得慢。但在现实中，我们已看到多种病毒株的出现，生命力较强的病毒株具有更强的传播性和/或躲避免疫系统的特性。

原称B16172的德尔塔变种病毒，目前是新加坡的主要病毒株，病例会产生更多的呼吸道分泌物，导致传染率上升。然而，它是否会导致更严重的疾病还有待确定。我们已看到接种疫苗的人被感染并传染给别人。不过，疫苗降低了患重症的风险和潜在传播可能性。

在当前阶段，单靠疫苗并不能成为防疫的唯一策略。我们须要进一步了解是什么使我们面临巨大的感染风险。一种简单的解释就是当我们拿下口罩吃喝的时候。这些都是家中常见的活动，这也解释了流行病学的观察结果，即近70%的病例都来自本身的家庭。还有一种传播情形是，通过被污染的物体或在公共场所触摸被污染的表面，因为我们不知道之前的使用者是谁。

在自然界中，人类的基因进化无法跟上病毒进化的步伐。要对付这个病毒，我们须要利用科技。例如，开发追踪病毒进化和活动的方法，以了解它如何入侵我们的身体并与之相互作用的机制。

但值得注意的是，生物体，无论大小，都在努力生存和繁殖。人类和SARS-CoV-2都将找到实现这两个目标的方法。SARS-CoV-2会不断进化，以摆

脱我们的疫苗或治疗方法等对策。疫苗会定期更新，也许有一天，病毒会被驯服，成为一种季节性的人类冠状病毒。

### 与冠病共处

人类天生就是群居动物，这是写在我们的基因里的。SARS-CoV-2无意中破坏了这种社会结构，改变了我们的社交方式。由于人类的基因进化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我们须要借助快速发展的科技来缓解病毒对人类的影响。例如，科技帮助我们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开发和推广针对这种新型病原体的疫苗，让人类能够转向虚拟通信来彼此交流，通过人工智能加强了数据的收集等等。虽然新加坡有运用科技的能力，但在全球病例不断增多的情况下，我们不能独善其身。在所有人（或国家）都安全之前，没有人（或国家）是安全的。

在进入更为宽松的解封第三阶段后，新加坡最近采取措施收紧限制。与SARS-CoV-2的斗争是动态的，而且远未结束。在短期内，我们可能不得不调整限制措施，以将病例数保持在可以应对的范围内。科技使我们无须离开私人空间就能联系，海外旅行可能会受到更多限制，在边防采取类似于医院感染控制做法的强化安全措施，对于防止病毒再次传入我们这个岛国至关重要。

社区要保持韧性，每个人就得尽一己之力，重新调整日常的生活方式，以抵消病毒带来的风险。大家是否不必再戴口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风险评估。疫苗仍然是一项重要的防疫措施。为了公共利益，我们必须继续保持良好的习惯，如身体不适就留在家中、有呼吸道症状就戴上口罩、咳嗽或打喷嚏时捂住口鼻、经常洗手、在小贩中心及食阁用餐后归还托盘、保持环境清洁、不乱丢垃圾等。

作者是国家传染病中心主任 黄金顺译

## 流浪大象的中国故事

2019年，中国科幻电影《流浪地球》不仅以46.88亿元人民币成为当年票房冠军，也让世界认识到了中国电影工业的能力，更证明了——一个精彩的中国故事能够在世界叫好叫座。时间来到疫情后的2021年5月，在中国云南省境内发生的一场“流浪大象”的实况秀，又一次吸引了来自全世界的眼球。

16头野生亚洲象自去年3月从西双版纳纳养子保护区离开，一路“象”北，历经15个月抵达昆明，期间经历了两头成年象脱离回归保护区，一头小象出生，如今总共15头象的流浪大军，随着世界各国媒体的直播报道，在中国、美国、欧洲、中东、日本、新加坡，人们像追看热剧一样关注着流浪大象的故事。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近期就强调，要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在全球疫情笼罩，中美两个大国激烈竞争，其他国家主动或被动“选边站”的大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展示自身的软实力，“不战而屈人之兵”，扩大朋友圈，成为当今中国所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

无心插柳柳成荫，这一次中国云南的“大象真人秀”，反而在西方媒体的广泛报道下，成为了今年中国最好的国家公关宣传片。15个月，直线距离500公里，随着象群迁徙而入镜的中国西南风土人文，让世界见识到了中国的地大物博以及壮美风景。而沿途民众对于象群造成环境破坏与食物糟蹋，表现出的是包容及大度，又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农村脱贫致富的实效，以及中国人民的勤劳与善良。

作为远离北上广深的边陲省份，云

南各级政府为象群沿路破坏造成近千万元人民币的损失给予政府赔偿，并配备了大批警力及高科技无人机进行24小时监控，柔性引导象群前进路线，以不扰民不扰象为前提。而经过20多年的动物保育努力，云南境内的野生象由170头增加到超过300头。从这样一个独特视角，更能让世界信服中国整体硬实力的强大。

我国建国总理李光耀曾经把中美两个大国的竞争比喻为：两头大象打架，草地遭殃。必须理性地看到，美国作为二战后的第一强国，美国文化及价值观得以向全世界输出，也因此在世界舆论占据绝对优势地位。中国作为新崛起大国，必须找到宣传自身软实力的最佳方式，毕竟四两拨千斤的柔力，一直蕴藏在上下5000年的中华文化之中。

大象作为庞然大物，哪怕是和平渡河，也会给河水带来涟漪。中国的崛起是美国的挑战与机遇，也与世界各国的利益与命运相关。

虽然目前中美外交就病毒溯源等课题争得剑拔弩张，但中美贸易却出现了强势增长，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今年首四个月，中美贸易总值1.44万亿元人民币，同期增长了50.3%；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数字是，亚细安10国已经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贸易总值1.72万亿元人民币，增长了27.6%。

连一向咄咄逼人的西方媒体，在此次报道“流浪大象”的过程中，都流露出了发自内心的善意及美好，透过西方视角的镜头与屏幕，世人看到新出生的小象依偎着象妈妈，席地而眠，又怎会不对这样一个保护自然、热爱生命的国家及人民产生好感？

作者是企业集团总裁，创投家

## 走出对老一代美国“中国通”的情结

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的一代人，即中国人爱说的“70后”和“80后”，现在已经进入拜登对华政策团队，将在很长时间内影响乃至主导美国对华政策。

这一部分人也已经引起中国学界的关注，并有相应的详尽分析出炉。观察家注意到，美国新生代对华政策制定者和建言者，普遍对中国持冷静和警觉的态度。

在笔者看来，这样的分析以及持续的注意，乃至中国对美国观察的与时俱进是必要的，而且应该继续加强。更进一步说，中国国内的关注点，应该尽快走出对老一代美国汉学家的某种“情结”，直面新的形势。

就笔者的长期观察，如果就文化比较而言，中国人比美国人重感情，更念旧，更爱怀旧。这个特点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温情面向，有时候也可以成为中国对外交往中的一种特有方式，即不妨“打打感情牌”。

但是，英语文化本质上是更为理性、冷静、精明的商业—法律文化，更着眼于现在的实际和未来的前景，对过去并不特别留恋。在学术研究中也是如此，中国人奉为大师经典的著作及其判断，往往被美国学者看成过时的观点。

表现在中国人对待美国老一代政学两界“中国通”的态度上，也可以明显看出，中国人非常欣赏和珍惜美国老一

代“中国通”个人对中国的善意和感情，甚至在某些时候把维系和改善中美关系，以及促进文化沟通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他们的逝去，往往在中文世界引起持久的反响和纪念。

老一代“中国通”和美国多数人文社科学家一样，普遍受到20世纪前半叶的左翼思潮影响，对中国这个东方古老文明的革命和现代化充满同情和好感。中国人民在抗战期间的坚持抵抗，与美国的密切合作，也是赢得这些汉学家敬意的因素。

笔者不久前还收到一封电邮，一名美国人出示了自己爷爷当年作为美国空军基地的一员，抗战期间在成都附近的几张留影，希望笔者帮忙辨认其中一名中国人是不是他所认为的“李宗仁”。通过照片比对，笔者否定了这个猜想；但是笔者告诉他，历史就是这样有趣，本人的外公当年就作为普通四川农民的一员，在成都附近为美军修过机场。

提这个例子是想说明，特定历史情境下的中美交集及合作，以及美国学者对中国革命的关注，是老一代汉学家和“中国通”的重要精神资源和情感库存，也是一代美国人的珍贵记忆。

在上世纪中国处于长期封闭的情况下，美国的“中国通”一方面坚持认为，在二战后的全球民族解放运动大潮中，中国革命中追求民族独立的动机，胜过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并且普遍服膺于毛泽东的个人魅力；另一方面也认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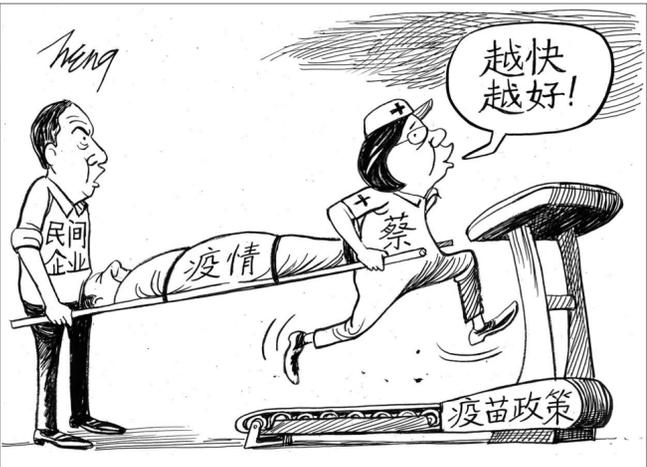
中国人作为一个独具特色的东方文明，不论在何种政治制度下，都比咄咄逼人的苏联更能够让人亲近。

上个世纪60年代美国卷入越战及由此引发的反战风潮，继续催生出新一代比二战一代自由派“中国通”更加激进的左翼汉学家。在这部分人接受学术训练的年代，出于对美国主流政治及其宣传的逆反、对越南问题的关注，他们更加向往封闭而神秘的红色中国。

体现在著述和观点中，这部分人虽然也以美国利益为终极指向，但的确不乏为中国辩解，有时甚至为中国想办法的言论。另外，在上个世纪的“中国通”中，还存在美国传教士在华生育的子女，这是一个对中国有特殊情感的群体。

但是，这些特定历史情境下的思潮和人物，如今已经不复存在。美国的中国研究者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就可以自由进出中国留学、旅行、教学、查阅资料、合作研究，同时见证了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体验了中国现代化为他们提供的便利。但是他们对待中国的态度中，也同时失去了20世纪上半叶由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追求独立的正义性，革命天然带有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以及席卷全球的左翼思潮所引发的巨大的思想和情感动能。

在这个激情能量消失的同时，中国也进入了长期和平稳定治理的“后革命”状态。美国的中国研究者对华态



特约漫画 王锦松

度必然也趋向更加冷静务实。

在学术生态层面，上世纪80年代以降，强大的后现代思潮，又推动美国社会科学界普遍怀疑和试图瓦解“宏大叙事”“民族国家”“统一”等现代性的观念，转向同情边缘群体，维护弱势群体权益，反对一切宰制的思维路径。在接受这种学术训练的新一代“中国通”眼里，帝制崩解以后的现代中国所追求的再度强大和统一及其叙事，已经成为审视和批判，而非同情和支持的对象。

随着中国的崛起和不断富裕，曾经引起“同情”的因素已几近消失。中国更多地被当成强国和对手，而不再是过去那个多少有点被美化的东方文明和革命中的苦难民族。随着时势转移，今天的美国也越来越处于“以攻为守”和“自卫反击”的态势中，须要防范和遏

制中国所带来的挑战。

综上所述，美国文化心理中较强的趋新而不恋旧的倾向，以及世界局势和思潮本身不可逆转的巨变，导致美国的新生代“中国通”难以复制老一辈汉学家对中国的私人的善意或情结。新生代并非不了解中国，也并不缺少在中国生活的经历或足够的中文能力，但的确缺少某种情感和憧憬。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思潮和属于它的问题。中国人要看清这一大势变迁，逐渐走出对于已经成为历史人物或正在走入历史的老一辈“中国通”的怀旧情结，直面美国70后和80后新生代主流对华外交家和学者，以及他们的社会文化背景，更多地了解他们，因为他们才代表当下甚至未来。

作者是美国阿勒格尼学院历史系副教授